

21世纪普通高等院校文科示范教材



中国现当代文学史

主编 樊星

下册



武汉大学出版社
WUHAN UNIVERSITY PRESS

21 世纪普通高等院校文科示范教材

中国现当代文学史

下册

樊 星 主编

武汉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下册/樊星主编.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6
21世纪普通高等院校文科示范教材
ISBN 978-7-307-09629-5

I. 中… II. 樊… III. ①中国文学—现代文学史—高等学校—教材
②中国文学:当代文学—文学史—高等学校—教材 IV. I209.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42730号

责任编辑:易 瑛 责任校对:黄添生 版式设计:马 佳

出版发行:武汉大学出版社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电子邮件:cbs22@whu.edu.cn 网址:www.wdp.com.cn)

印刷:湖北金海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787×1092 1/16 印张:19 字数:458千字 插页:1

版次:2012年6月第1版 2012年6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307-09629-5/I·529 定价:30.00元

版权所有,不得翻印;凡购买我社的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目 录

第十九章 当代文学的特质与成就·····	251
第一节 当代文学的特质·····	251
第二节 当代文学的历史地位·····	255
第二十章 “十七年”诗歌·····	260
第一节 概述·····	260
第二节 郭小川、贺敬之的诗歌·····	266
第三节 闻捷的诗歌·····	271
第二十一章 革命史小说·····	273
第一节 概述·····	273
第二节 《铁道游击队》与《林海雪原》·····	276
第三节 《青春之歌》与《红岩》·····	281
第二十二章 “合作化”小说·····	286
第一节 概述·····	286
第二节 《山乡巨变》与《创业史》·····	289
第三节 赵树理的小说·····	293
第二十三章 “十七年”散文·····	297
第一节 概述·····	297
第二节 杨朔、秦牧的散文·····	299
第三节 《燕山夜话》·····	301
第二十四章 “十七年”戏剧·····	304
第一节 概述·····	304
第二节 历史剧·····	308
第三节 革命现代戏·····	312
第二十五章 “文革”文学·····	316
第一节 概述·····	316
第二节 地下诗歌·····	319

第三节	浩然的《艳阳天》	323
第二十六章	新时期诗歌	326
第一节	概述	326
第二节	“朦胧诗”	332
第三节	“后崛起诗”	342
第二十七章	从“伤痕文学”到“改革文学”	349
第一节	“伤痕文学”	349
第二节	“反思文学”	353
第三节	“改革文学”	357
第二十八章	“寻根文学”	362
第一节	概述	362
第二节	韩少功的小说	368
第三节	贾平凹的小说	371
第二十九章	新潮小说	375
第一节	概述	375
第二节	马原和“马原的朋友们”	381
第三节	孙甘露的小说	385
第三十章	“新写实小说”	388
第一节	概述	388
第二节	刘恒、刘震云的小说	390
第三节	方方、池莉的小说	394
第四节	苏童、余华的小说	399
第三十一章	女性文学	405
第一节	概述	405
第二节	张洁及1980年代初期其他女作家的小说	409
第三节	王安忆、铁凝与迟子建的小说	414
第四节	林白、陈染的小说	421
第三十二章	“知青文学”	427
第一节	概述	427
第二节	张承志、史铁生的小说	429
第三节	王小波的小说	434

第三十三章	历史小说 ·····	438
第一节	概述·····	438
第二节	《李自成》、《白门柳》·····	441
第三节	《少年天子》、《曾国藩》与《雍正皇帝》·····	445
第三十四章	“新生代小说” ·····	453
第一节	概述·····	453
第二节	韩东的小说·····	459
第三节	毕飞宇的小说·····	464
第三十五章	新时期散文 ·····	470
第一节	概述·····	470
第二节	贾平凹的散文·····	475
第三节	余秋雨的散文·····	478
第四节	新生代散文·····	481
第三十六章	新时期的报告文学 ·····	484
第一节	概述·····	484
第二节	“诗化的报告文学”·····	486
第三节	“全景式报告文学”·····	488
第四节	贾鲁生的报告文学·····	490
第三十七章	新时期的“探索戏剧” ·····	493
第一节	概述·····	493
第二节	沙叶新的戏剧·····	498
第三节	高行健的戏剧·····	500
第四节	“新生代”的话剧·····	504
第三十八章	新世纪文学 ·····	507
第一节	概述·····	507
第二节	阎连科的小说·····	509
第三节	陈应松的小说·····	510
第四节	严歌苓的小说·····	512
第三十九章	百年台港澳文学 ·····	515
第一节	台湾文学·····	515
第二节	香港文学·····	528
第三节	澳门文学·····	537

参考文献..... 541

后 记..... 543

第十九章 当代文学的特质与成就

第一节 当代文学的特质

当代文学，一般指的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文学。然而，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文学与现代文学中的延安革命文学有着紧密联系，它是在延安革命文学的根基上发展起来的，因此，有学者将当代文学的上限划在延安革命文学中，也就言之成理了。如此看来，从政治史的角度看，194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学的历史起点；而从文学史的角度看，延安革命文学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学的源头。

在毛泽东时代，延安革命文学被普遍认为是文学发展的正确方向。其宗旨是为工农兵服务；其功能是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其方针是民族化、大众化；其标准是政治第一、艺术第二。这一切，都集中体现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简称《延安讲话》）中了。因此，那篇讲话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中成为了当代文学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应该充分肯定《延安讲话》的历史功绩：以赵树理的小说《小二黑结婚》、周立波的小说《暴风骤雨》、李季的叙事诗《王贵与李香香》、贺敬之等集体创作的歌剧《白毛女》等为代表的革命文学在战争年代的确发挥了动员劳苦大众投身推翻旧社会、建设新生活的巨大政治作用。同时，革命农民和士兵成为了文学的主人公，也有别于古典文学中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是文学主人公的传统，在中国文学史上开辟出了一个讴歌平民英雄的崭新时代，并因此产生了一批描绘人民革命壮丽画卷的“红色经典”——杨沫的小说《青春之歌》，曲波的小说《林海雪原》，知侠的小说《铁道游击队》，吴强的小说《红日》，罗广斌、杨益言的小说《红岩》，徐光耀的小说《小兵张嘎》都是其中的优秀代表。

另一方面，也应该看到：适应战争年代需要的文学毕竟有其历史的局限性。文学为工农兵服务是不错的，但因此而忽略了为知识分子服务就显得偏颇了（而这样的忽略又是与一系列“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和运动密切相关的）；文学有团结人民、教育人民的功能，但因此而忽略了文学还有娱乐人民、表现人民丰富多彩的文化与生活的功能，也使得文学的天地变得狭窄了；文学应该有民族化、大众化的发展道路，但因此而忽略了继承现代文学走向世界文学的伟大传统，文学就难以获得多元的营养；至于政治标准第一，更是成为一系列政治运动（从1950年代对电影《武训传》

的批判、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以及文艺界的“反右运动”到1960—1970年代的“反修运动”、“文革”)从文艺批判开始的依据,也是许多作家不得不瞻前顾后、畏首畏尾,不敢自由创作的禁忌所在。

不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学毕竟有了延安革命文学不具备的一些新质:

首先,是外国文学的影响。1950年代,苏联文学中那些保持了人道主义传统和批判现实精神的作品深刻影响了中国作家,使他们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为工农兵服务”和“民族化、大众化”的框框,催生了一批文学水准显然高于延安革命文学的作品。例如王蒙的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就得益于苏联小说《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小说主人公林震的身份也是知识分子干部;又如刘绍棠深受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那诗化风格影响的“乡土小说”;还有周立波学习肖洛霍夫《被开垦的处女地》写出的小说《山乡巨变》……虽然1950年代末,随着中、苏两党的分裂,苏联文学也被打成了“修正主义文学”,但其影响已经远非“大批判”能够消除得了的。另外,1960年代初,为了使共产党干部对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和“修正主义思想”有所了解,有关部门出版了一批“内部发行”的西方文学、哲学、政治学著作,其中既有爱伦堡的《解冻》、《人·岁月·生活》,沙米亚金的《多雪的冬天》,阿克肖诺夫的《带星星的火车票》,叶甫图申科的《〈娘子谷〉及其它》,艾特玛托夫的《白轮船》,索尔仁尼琴的《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这样一批富有忧患意识、批判精神、个性色彩、浪漫风格的苏联作品,也有凯鲁亚克的《在路上》、加缪的《局外人》、萨特的《厌恶及其他》这样一批西方“现代派”的作品。这些作品后来流传开来,对于“文革”“地下文学”的影响十分大。

其次,延安革命文学的支流——以孙犁的《荷花淀》为代表的,富有古典诗情画意的作品和1960年代公开发表的毛泽东诗词,对于推动当代文学与古典文学的对接具有重要的意义。孙犁一直推崇柳宗元的文章和《聊斋志异》、《红楼梦》。围绕在孙犁身边的一批青年作家(如刘绍棠、从维熙等)渐渐形成了文风清新、俊逸的“荷花淀派”,他们继承了现代文学中废名、沈从文、萧红的“诗化小说”传统。而毛泽东诗词对于郭小川的“新辞赋体”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些事实表明:当代文学也继承了古典文学的传统,并因此而超越了所谓的“大众化”。

还有,在政治运动的间隙,一批在现代文学发展史上已经取得了可观成就的作家继续探索,写出了相当有文学价值的力作——老舍的话剧《茶馆》、郭沫若的历史剧《武则天》、陈翔鹤的历史小说《广陵散》、姚雪垠的历史小说《李自成》(第一卷)、丰子恺的随笔《庐山游记》、徐迟的报告文学《祁连山下》……都是重要成果。这些作品显示了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的深刻联系,也显示了有着现代文学根基的作家在创作方面的独到优势——因为深受五四文化影响而富有深厚的文化底蕴、非凡的文学才华。

因为有了这些作品,当代文学事实上并非只是延安革命文学的简单延续。

爆发于1966年的“文革”不仅是当代文学的浩劫,而且是现代文化史上空前的人祸。“八个样板戏”那样的“工农兵文艺”已经异化为“造神运动”的传声筒。在百花凋零的文艺舞台上,“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文艺也终于沦落为“帮派”文艺。另一方面,以“白洋淀诗歌”和“手抄本小说”《波动》、《公开的情书》、《第二次握手》为代表的“地下文学”的悄然流行,又显示了“异端”思想和文学的顽强生命力,显示了文学青年对黑暗现实的强烈不满、对文学自由的热烈追求。“白洋淀诗歌”的“现代派”风格和《波动》、

《公开的情书》中燃烧的批判现实情绪事实上标志着五四精神的回归，预示了新时期文学的开始。“白洋淀诗歌”是新时期“朦胧诗”的重要源头之一。《波动》、《公开的情书》是新时期“伤痕文学”的重要源头之一。而《第二次握手》这部讴歌知识分子爱国情结的作品也开启了新时期知识分子文学思潮（从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苏叔阳的话剧《丹心谱》、戴厚英的小说《人啊，人！》、张贤亮的小说《绿化树》到王蒙的小说《活动变人形》、方方的小说《祖父在父亲心中》、王刚的小说《英格力士》……）的先河。“地下文学”因此成为“文革”时期文学史上闪光的一页。它是五四文学与新时期文学之间的一座桥梁。

在政治上，新时期开始于1976年10月。然而一直要到1977年11月《人民文学》发表了刘心武的小说《班主任》，才被公认为是新时期文学的第一股浪潮——“伤痕文学”的开始。由此可见，新时期的开端也呈现为一个比较复杂的过程。《班主任》因为暴露了“文革”中“愚民政策”在青少年心中刻下的伤痕而产生了振聋发聩的“轰动效应”，从而打破了“工农兵文艺”的僵化模式，恢复了文学批判现实的传统。稍后，小说界的“反思文学”、“改革文学”、“探索小说”此起彼伏，诗歌界的“朦胧诗”从“民间刊物”走上了公开发行的刊物并且引发了一场不同意见激烈交锋的争鸣，“探索戏剧”也闪亮登场……现代文学以后又一个文学多元发展的春天终于到来。

所谓文学多元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文学观念多元化了。思想解放了，文学不再被看作是为政治服务的工具，而呈现出丰富的意义：对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文学具有了批判现实的功能；对于“探索小说”、“朦胧诗”、“探索戏剧”，文学具有了“表现自我”的功能；而对于“寻根文学”，文学又富有了寄托文化理想的浪漫色彩。

二是文学创作手法多元化了。“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无疑以批判现实主义手法为主；“改革文学”和“军旅文学”则带有相当鲜明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色彩；“探索小说”、“朦胧诗”、“探索戏剧”是“现代派”文艺遍地开花的证明；“寻根文学”和许多历史小说则是浪漫主义手法的结晶；而汪曾祺、贾平凹、何立伟等人的“诗化小说”、“笔记小说”，则是古典文学遗风犹在的硕果。

思想的解放导致了文学的解放；文学的解放也促成了思想的进一步解放。1980年代的文学，因此而辉煌，令后来者无限向往。

应该看到的是，1980年代末以后，随着现实社会中世俗化浪潮的高涨，文学的世俗化思潮也汹涌澎湃了起来。1986年诗歌界的“现代诗群体大展”^①对于“新生代”诗人颓唐、冷漠情绪的表达，小说界的“新写实小说”对于日常生活“一地鸡毛”状态的冷漠描写和充满玩世不恭情绪的王朔小说的畅销，已经体现出浪漫主义的退潮。描写世俗生活压力、渲染狂欢欲望成为许多作品的基本主题。这一浪潮到了1990年代更加普及。虽然批评界对于“新生代”诗人颓唐、放纵欲望的粗鄙化现象和王朔小说的玩世不恭倾向多有批判，但在许多文学青年中，认同文学的世俗化甚至粗鄙化、狂欢化的风气一直很有市

^① 1986年10月，《深圳青年报》和安徽《诗歌报》同时推出“中国诗坛1986'现代诗群体大展”，显示了“与传统断裂”的决心与焦躁。这次大展的作品后来由徐敬亚、孟浪、曹长青、吕贵品扩编成《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观（1986—1988）》一书，1988年交同济大学出版社出版。

场。池莉的“过日子小说”，林白、陈染、卫慧、棉棉的“身体叙事”（亦称“欲望叙事”），贾平凹颇有《金瓶梅》风格的《废都》，都因此成为1990年代的文学“热点”。这些“热点”与富有“小资情调”的“张爱玲热”的回归，成为1990年代文学世俗化思潮的典型现象。另一方面，也有一部分作家继续在重塑民魂方面作出了引人瞩目的成就——张承志的《心灵史》、陈忠实的《白鹿原》、韩少功的《马桥词典》、余华的《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或讴歌民魂的伟大，或揭示文化的深厚，都显示了文学的崇高、恢弘之气没有泯灭。与此相呼应的，是长篇历史小说的繁荣——刘斯奋的《白门柳》，唐浩明的《曾国藩》、《杨度》、《张之洞》，二月河的《康熙大帝》、《雍正皇帝》、《乾隆皇帝》，凌力的《倾城倾国》、《暮鼓晨钟》、《梦断关河》……这些有着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畅销历史小说许多都开笔于1980年代，完成于1990年代，是当代作家探寻民族文化、重新塑造民族魂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历史小说的主人公，都是有担当、有作为的历史人物。这些作品的畅销与持续升温的“金庸热”一起，显示了世俗化年代里依然存在的英雄崇拜。同时，这些作品的畅销也为1990年代民族主义文化思潮的高涨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虽然批评界不时会出现质疑历史小说中存在着“帝王崇拜”的隐忧之声，读者仍然可以从感受到激荡的英雄气。

于是，世俗化的浪潮和讴歌民魂的浪潮就在1990年代形成了截然不同、各有千秋的文学景观。这两大景观显示了1990年代文学精神的复杂：一方面，现代化的进程必然导致世俗化浪潮的高涨，人们在现实生活的压力下越来越务实；另一方面，文学对于精神境界的无止境追求必然催生出超越现实、追问历史、探寻文化的思潮，这又体现了文学的务虚品格。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全社会对“三农”问题^①乃至“社会公平”问题的关注，文学界反映“底层”疾苦的作品有了突出的发展。以曹征路的小说《那儿》，罗伟章的小说《我们的路》、《大嫂谣》，陈应松的小说《马嘶岭血案》，胡学文的《命案高悬》，林白的《妇女闲聊录》，迟子建的《世界上所有的夜晚》为代表的“底层写作”其实是1980年代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如史铁生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郑义的《远村》、朱晓平的《桑树坪纪事》、方方的《风景》等小说）和1990年代“现实主义冲击波”（如谈歌的《大厂》，何申的《穷县》、《穷乡》，关仁山的《九月还乡》）的延伸。另一方面，严歌苓的长篇小说《第九个寡妇》、刘震云的长篇小说《一句顶一万句》则在深入探讨“底层”民众的朴实、坚忍和孤独、渴望倾诉方面写出了新的气象：写出民魂的特别来。而都梁的长篇小说《亮剑》和石钟山的长篇小说《激情燃烧的岁月》也是21世纪具有“轰动效应”的名篇——根据两部小说改编的电视剧的热播唤起了人们对于“红色年代”的浪漫记忆。两部作品的主人公都是具有男子汉阳刚之气的革命军人，同时又是保持了朴素、顽强、粗犷、鲁莽本色的农民英雄。因此可以说，这两部作品也写出了民魂的特别。

网络文学的异军突起，是1990年代末以来文学的一大盛事。随着互联网的迅猛发展，一批青年作家开始在网上发表文学作品，其中不乏有新意的创作。1997年，邢育森的小说《活得像个人样》在网上迅速传播。次年，李寻欢在网上发表《迷失在网络中的爱情》。

^① “三农”问题指的是中国大陆的农村问题、农业问题和农民问题，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问题，包括贫富差别悬殊、城乡发展不均衡、流动人口、农民减负等问题。

这两部作品都写到了“网虫”的生活，打开了一扇了解网络时代新奇人生的窗户。深受港剧和王朔影响的宁财神则以轻松搞笑的《缘分的天空》、《假装纯情》为人熟知，后来更以电视连续剧《武林外传》走红一时。邢育森、李寻欢、宁财神曾以“网络三驾马车”^①闻名。此外，2000年安妮宝贝的《告别薇安》、2001年今何在的《悟空传》、2002年慕容雪村的《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都曾产生过“轰动效应”，其纸质文本迅速成为畅销书。其中，《告别薇安》富于唯美的风格，《悟空传》是“大话西游”的游戏之作，而《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文风泼辣，描写了当代青年的狂欢以及因此付出的沉重代价，是网络文学中的厚重之作。网络不仅为广大青年作者提供了自由发表作品的平台和激烈竞争的工场，也产生出了具有很高文学价值的力作。同时，网络文学的热闹也显示了文学的强大生命力。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这样的基本结论：

第一，当代文学是现代文学的延伸。

第二，当代文学从一开始就具有非常浓厚的政治色彩，这既是它区别于现代文学的重要特质所在，也是它的历史局限性所在。

第三，当代文学中也产生了不少超越了现代文学的佳作。这些佳作更富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复杂的人生哲理。

第二节 当代文学的历史地位

现代文学三十年，由于中西文化空前猛烈的碰撞，由于一批学贯中西的文学天才的风云际会，成就了中国文学史的奇观。那样的风云际会是可遇不可求的事情。不过平心而论，像胡适、鲁迅、周作人、郭沫若、郁达夫、茅盾、巴金、老舍、曹禺、沈从文、林语堂、冯至、钱钟书等人那样能同时在好几个文化领域都有所创造的大师级人物（有的是小说、散文、诗歌、评论、翻译、办刊物全面开花，有的是文学、政论、历史研究都出手不凡，还有的是一身而兼作家与教授），大概也不出二十人吧。其余的，包括好些名噪一时的作家和作品，今天读来，成就其实相当一般。

与那一代人比起来，经过当代文化（主要是俄苏社会主义文学和延安革命文艺）熏陶出来的两代作家（当过“右派”的一代和当过“红卫兵—知青”的一代）有先天的不足：缺少学贯中西的训练，饱经政治运动的折腾，并因此而荒废了许多时光。但他们也有他们的时代优势：因为经历过“文革”那样的乱世而练就了看破政治骗局的“火眼金睛”，又因为身逢1980年代“新启蒙”的思想解放运动而迅速追赶上了西方文化新思想，还因为站在了世纪末的高度回眸风云多变的百年世事而有了许多关于中国文化、中国政治、中国命运的新发现。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中，才有了来之不易的新时期文学的“造山运动”。三十年时光（又是一个“三十年”！）流逝过后，这“造山运动”的成就也堪称辉煌——这是由几代作家共同奋斗、创造出来的辉煌。这辉煌对现代文学的超越主要体现在：

一方面，从文学创作的实绩看，新时期文学的政治色彩的空前浓厚和文化意识的十分强烈都具有特别的意义。如果说，现代作家多是从“思想启蒙”方面呼唤“改造国民性”，

^① 田志凌：《中国网络文学十年：“三驾马车”今安在》，《南都周刊》2009年5月22日。

那么，新时期作家则从无情的历史出发，将对于中国的思考更集中于对政治痼疾的深入探讨中。显然，当代中国许多悲剧产生的原因除了“思想启蒙”的中止以外，更多的应该说还是政治痼疾的愈演愈烈。于是，当代作家将“新启蒙”更集中地聚焦于暴露政治痼疾上就体现出了鲜明的当代感——小说方面，新时期的“政治小说”和“长篇历史小说”的丰收显然是现代文学所不能比拟的。无论是《古船》、《两程故里》、《白鹿原》、《故乡天下黄花》、《羊的门》那样洞悉中国政治斗争残酷底蕴的“家族政治小说”，还是《曾国藩》、《白门柳》、《少年天子》那样重新认识民族魂、重新塑造民族文化精神的“长篇历史小说”（这些历史小说也可以归入“政治小说”中，因为其中的主要人物仍然是政治家，作品的主要题材也仍然是历史上的政治生活），都表现出了当代人空前成熟的政治智慧（如将“阶级斗争”还原为“家族斗争”和“权力斗争”；更将“家族斗争”和“权力斗争”的心计与权谋写到令人震撼的程度）和独特的文化使命感（这使命感不是一般的“弘扬民族文化传统”，而是特别注重刻画燃烧着忧患意识、充满了痛苦抉择的历史人物及其文化担当）。在冥冥中，这些“政治小说”和“历史小说”事实上集中体现了当代知识分子的主要关怀：清算政治的历史旧账，呼唤勇于承担的民族精魂的回归。同样的呼唤也体现在1980年代风起云涌的报告文学热潮中——从《人妖之间》、《希望在燃烧》、《土地和土皇帝》、《活祭》那样暴露政治痼疾的报告文学到《海葬》那样深刻反思历史改革悲剧的纪实力作，都显示了新时期作家关注政治、研究政治、批判政治达到的思想深度。姑且将这些具有强烈政治意义的报告文学、纪实力作统称为“政治性报告文学”吧，以区别于那些常见的反映一般建设成就或社会问题的报告文学。而那些积极关切政治的报告文学作家们满腔热情为改革呐喊的使命感也曾经感动了一个时代。蓦然回首，中国历史上似乎还有过这么一个时代：在饱经政治运动折腾以后，一旦思想解放就渴望摆脱极“左”政治枷锁束缚的作家们，却常常身不由己地会回眸不堪回首的往事，在具有强烈政治意味的小说和报告文学中表达自己的政治批判意识和呼唤民主的政治理想。而且，无论文坛风雨如何飘摇不定，他们仍然奋勇前行。其中体现了中国传统士大夫“兼济天下”的传统使命感，也显示了新时期作家对胡适、鲁迅那一代大师关心政治也批判政治的现代知识分子立场的继承，同时又在更空前的规模上开掘了问题的广度和深度。新时期作家的政治使命感是当代“新启蒙”运动的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上面提到的那些作品都是当代思想解放思潮的产物，同时也对于推动当代思想解放运动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有许多热血青年是读了这些作品以后增长了政治智慧，并且积极投入到为政治改革呼喊的激流中的！

另一方面，在现代文学史上，“改造国民性”的主题多是以暴露下层民众的愚昧、卑怯、蝇营狗苟、自欺欺人作为主要特质的。这样的暴露在揭示中国文化痼疾的同时也显示了那一代作家的理想主义设计：相信“国民性”是可以改造的。这样的暴露在新时期文学中有进一步的深化——从《陈奂生上城》那样的写实之作到《爸爸爸》那样的“新潮小说”，再到《新兵连》、《风景》、《米》那样的“新写实小说”，暴露的风格显然多色调了一些。但更值得注意的是，“重新认识国民性”的主题的产生与发展已经对“改造国民性”的主题有了明显的超越。从李準的《黄河东流去》对遭灾百姓顽强生命意志和灵活适应力的讴歌到张贤亮的《河的子孙》对农村基层干部以农民的狡黠与上面的极“左”政策巧妙周旋的欣赏，从李杭育的《珊瑚沙的弄潮儿》、郑万隆的《我的光》、莫言的《红高粱》对民间浪漫活法的赞美到阿城的《棋王》、张宇的《活鬼》、池莉的《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

余华的《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刘恒的《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对底层百姓“活下去”——那是麻木度日的“活”，但那麻木中是隐约可以使人感受到顽强、坚忍、豁达、皮实甚至狡黠、油滑的——活法的真切理解，是在摒弃了教化民众的启蒙姿态后重新认识民间的新思维。其中，又尤其以“活下去”的人生发现具有重要的思想意义，因为这样的新思维显然与“改造国民性”的思路大相径庭，但却同样发人深省。这样的新思维是在激进主义风潮已经随风而逝、世俗化浪潮随着现代化进程不断高涨、社会转型期的诸多矛盾却一时难解的背景下产生的，它对于认识现实人生的复杂性，对于培养理解底层、理解民间、理解世俗的朴素意识，具有不容忽略的意义。在政治上破除了“现代迷信”以后，新时期出现了“重返民间”的思潮。这股思潮不同于“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革命道路”，它不是建立在“劳工神圣”、“六亿神州尽舜尧”的立场上的，而是带有明显的返回民间，从民间的朴素、务实活法中找到远离崇高的安身立命之处的平淡色彩。应该说，这也是一种“启蒙”，一种破除了“将人民神圣化”的幼稚见解、还民间以本色的“启蒙”。革命年代的“革命人民”已经被建设年代的“本色民间”渐渐取代。因此，另一个与“改造国民性”分庭抗礼的主题也就浮出了历史的水面：“国民性”不一定那么好改造，甚至，常常也不一定需要激进的改造。在动荡的政治运动中，“改造思想”（不妨将这个政治口号看作“改造国民性”的变体）曾经引发了多少不堪回首的血腥悲剧，经历过的人们都记忆犹新。那样的运动反过来促成了当代人对“改造思想”的抵触与反感。加上在激烈的生存竞争中，活着已非易事，普通人哪里还有心思琢磨“理想人格”的问题。这样一来，“改造国民性”的主题就渐渐失去了当年那样强烈的影响。这当然不意味着中国的国民性不需要改造了。一直到今天，“素质”问题不是依然在影响着许多城市的形象塑造，影响着中国人的国际形象吗？回首百年风云，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一则，在战争、革命、政治运动和商品经济大潮的作用下，中国人的民族性好像已经发生了空前的巨变——变得在政治上更加敏感、经济上更加狂热，文化水平也有了明显的普遍提高；但是，中国仍然是中国——无论时代怎么变，中国仍然是讲等级、讲人情、讲关系、讲实惠，讲“难得糊涂”而其实是表面糊涂内心精明，讲“吃亏是福”却决不甘心吃闷亏，而是希望“吃小亏占大便宜”……任凭潮流怎么变，管他风向怎么转，这些活法其实没什么变化。不仅仅在民间没什么变化，在官场上，在知识分子中，这些东西甚至好像越来越明显了起来！连“文革”那样“触及人们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的大运动也最终没有根除掉诸如此类的“国民性”，更遑论其他！这一现象足以表明：中国的人情世故，中国人那些根深蒂固的文化品格，没怎么变，也很难变。正所谓：有所变，又有所不变；变中有不变，不变应万变。

不妨将还民间以本色的这股思潮看作当代“新启蒙”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时期的乡土文学（从《鲁班的子孙》到《浮躁》到《日光流年》）、市民文学（从王朔的“痞子小说”到《长恨歌》）、青年文学（从《三重门》、《上海宝贝》到《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中，在“寻根文学”、“新写实小说”中，都涌动着这样的主题：值此思想解放、人欲横流的当今之世，各人都在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着，在滚滚红尘中品尝人生的各种滋味。多元的文化观念、五花八门的价值观念，不过成为人们“各取所需”、为己所用的参考资料和“行动指南”。这是足以耐人寻味的现象：“启蒙”的本意是觉悟，从宗教迷信或政治迷信中觉醒过来，建构个性的世界观和人生观。而这样一来，也就为现代人按照自己的意愿去率性而活、按照世俗的欲望去打发时光铺平了通道。于是，我们很自然就看到了一幕幕文

学世俗化光怪陆离的景观。虽然“主旋律”文艺还在张扬着集体主义、爱国主义、英雄主义的精神（这样的精神其实是全人类共同的宝贵精神支柱，也为当代人文精神的建构所必不可少），但个性化、世俗化的风气已成不可阻挡的“大气候”。所谓“现代主义”，所谓“后现代”，说到底就是个性化、世俗化。（注意：虽然个性化、世俗化这两个词似乎彼此有些矛盾之处，但在实际生活中二者却常常是奇特又和谐地共处在一起的。我们不难在现实生活中，尤其是在流行的时尚中看出这一点来：人们总是在追赶个性化的潮流中不断证明着世俗化的强大力量的。）

因此，不妨用“破除‘现代迷信’”和“世俗化”作为理解新时期文学思想主题的两个关键词。而这两个关键词基本可以成为贯穿1980年代到21世纪三十年间的时代精神。新时期的几代作家，不论从怎样的人生体验出发，大都在冥冥中体现了这一时代精神。这样的时代精神正是新时期文学“当代性”的重要内核。显然，这样的时代精神与现代文学三十年间“启蒙”与“救亡”的双重主题已经很不一样了。

因此，如果说现代文学的精神实质是“启蒙”的（即精英的），那么新时期文学的精神特质则显然从“重新启蒙”很快转向“世俗化”的演变。如果说现代的“启蒙”精神没过多久就受到了“救亡”危机的冲击而戛然而止，那么，新时期的“重新启蒙”则在一个相对和平的环境中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并很自然地与“世俗化”的浪潮汇合在了一起。这样的汇合既显示了当代人的智慧，又显示了当代文化在多元发展中融会的特色。不再有战争的破坏，也不再有政治运动的压抑，才有了几代作家相对和平的创造心境——这样的心境是新时期文学三十年百花齐放的重要前提。于是，新时期文学才有了与现代文学三十年很不一样的文学景观：虽然缺少公认的大师作“文坛盟主”，却自有另一番壮丽的风景——新潮更迭得相当频繁；其中涌现出的优秀作家，也以出色的才华填补了前辈大师留下的许多文学空白（除了上面提到的“政治小说”、“长篇历史小说”、“政治性报告文学”和“重新认识国民性主题”的作品以外，新时期“现代派小说”、“女性文学”、“大散文”的成就都明显超越了前人）。更何况，随着当代传媒的空前发达，当代文学的影响力也在与时俱增。那些根据优秀作品改编的电影在国际上屡获大奖，那些阵容相当庞大的“网络文学”大军，也都已经证明：新时期文学的影响力并不逊色于现代文学大师的影响。

如此说来，新时期文学未可厚非。那种认为新时期文学不如现代文学的说法也许失之褊狭。

剩下的问题是：当今文学可否产生出新的大师来？有一种看法认为：这是一个不可能再产生出大师的时代。这个时代，文学的影响正在减弱；作家的心情也普遍浮躁……不过，应该看到，新时期以来，中国已经产生了几个具有国际影响的著名作家。至于他们算不算大师，我们站得太近，也许看得不那么清楚，相信后人会有评说的。而像曹雪芹那样的大师，身前寂寞，死后百世流芳；像沈从文那样的大师，几十年间被埋没，终于在晚年重放异彩……这些事例都足以表明，作家的运气常常是说不定的。还需要看到，文学是天才的事业，而天才是可遇难求的。谁说现代社会就再难产生大师了？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就是依然健在的公认的文学大师。他们的产生，不是预测的结果，也不是培养、“打造”的结果。他们是凭自己实力写出杰作，凭那些杰作产生的巨大影响成为大师的。所以，还是保持对于文学的乐观信念为宜。

当代文学已经走过了六十多年的曲折路程，新时期文学已经走过了三十多年的曲折路

程，这些年留下的遗产都有待于进一步的整理。“厚古薄今”的眼光，冷嘲热讽的口吻，都于事无补。

◎思考题

1. 你如何看当代文学与现代文学的精神联系与区别？
2. 从五四到新时期，“改造国民性”的主题经历了怎样的演变？你如何看待“国民性”问题？
3. 你如何看当代文学有没有大师的争论？

第二十章 “十七年”诗歌

第一节 概 述

在1949—1966年间的诗歌创作中，主旋律是颂歌。诗人们满腔热忱地讴歌新时代、新生活，讴歌共产党、毛主席，真实地反映了那个意气风发的时代人们的普遍心声。例如胡风发表于1949年11月的4600多行的长诗《时间开始了》中的抒情段落——“祖国/伟大的祖国呵/在你忍受灾难的怀抱里/我所分得的微小的屈辱/和微小的悲痛/也是永世难忘的/但终于到了今天/今天/为了你的新生/我奉上这欢喜的泪/为了你的母爱/我奉上这感激的泪。”“七月派”诗人绿原曾经高度评价过此诗：“当时歌颂人民共和国的诗篇实在不少，但从眼界的高度、内涵的深度、感情的浓度、表现的力度等几方面进行综合衡量，能同《时间开始了》相当的作品未必是很多的。”^①然而，由于诗中将毛泽东比喻为“一个新生的赤子/一个初恋的少女/一个呼冤的难主/一个开荒的始祖”等，发表不久就遭到了这样的批评：“把屁股坐在小资产阶级那一边，即使来歌颂战斗，歌颂人民胜利，歌颂人民领袖，也难以歌颂得恰当。结果是歌颂得没有力量，歪曲了人民胜利的事实，把人民领袖比拟得十分不恰当。不管作者的动机如何，它的效果总是不会好，而且是有害的”；“把毛泽东同志的形象歪曲地描画成为脱离人民群众的站到了云端里的神”，“这种夸大口气同毛泽东同志经常说的‘老老实实，勤勤恳恳’、‘甘为孺子牛’、‘甘当小学生’的思想是多么不同！”^②由此可见颂歌的创作从一开始就潜伏了隐患：其中既有如何“歌颂得恰当”的不同见解，也显然还有左派文人之间历史矛盾延伸的因素。

在众多的颂歌中，政治抒情诗的成就十分突出。那个年代的诗人们紧跟政治形势的发展，以饱满的政治激情去抒发自己的政治情怀，这也就为共和国写下了一部颂歌的历史。这方面的主要代表人物是郭小川和贺敬之。他们都是来自延安的诗人，他们的政治抒情诗都充满了革命的激情。同时，他们还善于在政治抒情诗的创作中进行锐意求新的探索：既有富于延安风味的“信天游”体（例如贺敬之的《回延安》），也有学习苏联革命

^① 绿原、牛汉：《编余对谈录》，见《胡风诗全编》，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776页。

^② 引自王巨川：《〈时间开始了〉》，《羊城晚报》2009年7月25日。